

新學網要

李伯鳴編著

文化叢書 第二種

新聞學綱要

李伯鳴編著

文 化 叢 書
新 聞 學 網 要

中 華 民 國 四 十 七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著 者 李 伯 鳴

主 編 者 朱 夢 曇

出 版 者 文 化 書 院

香 港 堅 尼 地 道 八 十 八 號

發 行 者 文 化 書 院 新 聞 學 會

香 港 堅 尼 地 道 八 十 八 號

經 銷 處 集 成 圖 書 公 司

九 龍 彌 敦 道 五 八 〇 號

定 價 港 幣 式 圓 伍 角

文化叢書編刊旨趣

人智進化，學術分功，創作之業，塗程匪一。欲窮智術之遐軌，觀各科之異同，則編輯叢刊，爲不可少。本院原名中華文化學院（後改名中華文法學院，並於三十七年秋擴展爲文化大學，三十八年遷港後改爲文化書院），創立之初，承中華文化學會原有計劃，即編印文化叢書之議。牽於人事，奄忽未成，茲勉力籌維，聿求實踐。叢書依原計劃，暫不分目，惟內容可別爲三種：

一 學校教本：作教科書用者。

二 學術專著：作專門研究參考用者。

三 時事問題：對於國內外時局之現實問題，作專門研究者。

譯述之作，亦可依上列內容，選擇從事，但刊行時當註明叢書譯述類，俾與本編有別。至於著譯文字，文言白話，皆所不拘，外國語文，亦可撰寫，其他細故，不復及焉。

吳 康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四月於台北

吳 序

友人李伯鳴教授從事新聞事業數十年，以其深厚之學理研究，長期之實際經驗，及多年之教學心得，撰爲新聞學一書。取材之廣博，敘述之詳明，論斷之平允，使新聞學圈外人讀之，亦能循序了了，有益於斯學之見聞者不淺。去冬來書囑爲作序。友人陳恩成博士爲新聞界之魁傑，已有長序述其與李教授從事報業始末，月前持此書全稿來，亦述作者之意，囑爲弁言。余於新聞學未嘗問津，不欲爲不知之作，貽笑達士。惟以昔歲在粵，創辦文化大學，其法學院新聞系，英才駢集。李教授任課其間，成材不少。大陸撤退，遷校香港，設文化學院，承繼校統，其新聞一系，由李教授主持。歲月易逝，亦已七年。此書博采精研，爲其研究之總匯，亦爲其在文大教學之成績。余於公私二者，似皆不能無一言以塞其請。無已，姑就學校辦新聞教育一義，畧陳管見，以助討論：

一、新聞事業之使命，在造成健全之輿論，尤以在目前吾國環境，所謂健全之輿論，至少應具

備左列各點：

1. 忠實的報導。
 2. 客觀的評論。
 3. 風氣的倡導。
 4. 文化的宣傳。
 5. 國策的闡揚。
 6. 忠奸的分辨。
- 二、造成一良好之新聞記者，謂宜具備左列資格：
1. 豐富的常識與至少一種專門學識。

2. 熟練寫作技術。

3. 嫻習外國語，至少一種。

4. 研究及現代史國際現勢。

5. 養成自由獨立不屈不撓之操守。

三、設立一良好之報館，似應具備左列條件：

1. 主持人須有造成健全輿論之抱負。

2. 根據此遠大理想，確立具體計劃，逐步實踐邁進。

3. 籌集經費，網羅專門人才，充實物質設備。

4. 報紙及附辦刊物之內容，質量並重，於政治社會國際資料之外，兼報導教育動態，宣揚學術文化，設特別資料室，以資研究，促進其發展。

5. 與國內外新聞聯絡，交換報章刊物，互派記者觀摩考察，去短取長，以促報業之進步。右述諸端，皆常識臆測所及，舉其瑩瑩大者，以就教於作者及新聞界賢達。嗟呼，風雨如晦，及鷄鳴待旦之辰；文字有神，正筆伐恢張之候。健全輿論，抒寫心聲，牖導文明，建設中國。

吳

康 于台大文學院

民國四十六年二月七日

陳序

這是一部屬於「正統派」的新聞學說。李伯鳴教授根據豐富的中外史實，加上博洽的從業經驗，兼有專精的文教學識，展望着崇高的社會理想，乃發揮卓越的新聞理論。這是很值得重視的著述。在本質上，這部論著頗側重於理論的研究，而研究的對象是側重報紙。在理想上，它認到新聞事業應屬於社會的「公共機關」，或並列為「公用事業」之一部門；在功能上，它認為報紙的發行是純粹的文化事業，因此應以社會福利的獲致為要旨，而不應為任何派系或團體的工具。

因此，視為新聞學者研究的課本，兼為從業人員參考的手冊，李教授乃綜合當前中國、日本、以及美、英、等地學者的論著，而加以編訂和闡揚或批評。這是一部很優良的課本，很切合實用的手冊。它可以擴展讀者的視線，啟發其思慮，而促進其新聞學識，或兼促進其技能和業務。

記者致力新聞工作逾三十年；在抗戰期間與李教授於廣州及韶關，堅守工作崗位時期亦頗久。深佩其豐富的學識與為國奮鬥的精神。今讀此書，愈能追溯多年來由於學識、經驗、與精神之累積，以歸納為理論的進程，則此理論之闡發當亦愈趨於正確而光大。

抗日戰前一年，李教授由南京回廣州，主辦前為國父手創以鼓吹革命的民國日報，旋為崇念國父而定名的中山日報。蘆溝事變後不久，該報同人深知戰禍已無法避免，祇有號召海內外同胞團結一致，擁護國策，奮起作英勇戰爭之一途，因此即在「八、一三」滬戰爆發前，中山日報已以特

大的「戰！戰！戰！」爲社論標題，而預測奮戰之必勝。

在廣州淪陷前，中山日報於正常發展報業外，並編行抗戰叢書，更協助粵省政府編印「新政周刊」，分發遍及全省各縣市鄉鎮機構，以及中小學校等文教社團；同時又贊助當地廣播電台，和其他宣傳團體，同謀以新聞報導從各方面發出，以普遍深入全省各城市鄉村爲目標，而兼與海外愛國的僑報相聯繫，使並得與廣大的僑胞社團通情志。在廣播方面，吳故主席鐵城先生亦已毅然由省府撥款加強當地的廣播工作，並訂購大量的收音機，以配給全省各縣市鄉鎮。這一類新聞事業的擴展，也就是中山日報在理論上所倡導，在工作上所力行，並在智能所及的範圍內協助政治機構，及其他文教團體，聯絡並進的實例。

抗戰叢書第一集已出「怒吼之中國」、「農戰要策」、「保衛大廣東」、「美國的外交」、「九國公約與國際聯盟應負的使命」和抗戰文藝等六種。新政週刊先後由名政論家潘公弼先生與記者主編，亦在廣州淪陷前出至四十五期。當時粵省不祇深感敵人的威脅，廣州等市尤爲敵機殘酷轟炸的目標。中山日報不祇在淪陷前絕無一日停刊，抑且愈戰愈奮，肩負其「華南精神堡壘」的使命，發揚國父英勇革命的遺教。

中山日報爲謀加強國際宣傳，更和加拿大歸僑張華領先生與李瑪麗女士（Mr. Edward Chang and Miss Mary Lee）等主辦的廣州英文日報（The Canton Gazette）相聯繫，而該報乃常譯載中山日報的精要社論，以標示國際人士。當時英人頗表親日，不免有袒日言論。美國於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隔離疫癘」的演講前，也還未禁止以汽油及廢鐵等戰畧物資大量輸入日本。中山日報均以犀利的筆鋒嚴加評議，或以友誼的情調婉轉說服。由於英文日報的贊助，不祇英美人士深受中

山日報言論的感動，即當時納粹德國駐粵總領事阿登柏博士（Dr. Frederic Altenberg）也深表讚佩。且傳與日本同盟社聯繫的日華通訊社也多譯發該報的社論，以示廣東精神之不可侮。英美各國駐粵的記者羣，對於中山日報的新聞報導和社論的要旨也時加注意，而採取爲其通訊資料的主要來源之一部。由此足徵中山日報，實於擴展國內宣傳之時，兼已致力於國際宣傳，而頗著績效。

廣州淪陷前，中山日報已分派人員、物資、器材，在粵東籌辦梅縣分版，並已儘先出版；又在粵西的梧州籌設分社，兼準備在粵北的韶關籌設分社。廣州淪陷之際，該報迅即在肇慶刊行戰地版；淪陷後，梧州和韶關分社也先後發刊日報；旋即於粵省府遷治地的韶關，設立中山日報總社。中山日報以一版而演進爲三版。雖在敵機狂炸之下，猶鎮定工作；或在敵騎侵迫之際，猶堅守崗位。韶關總社直至該地於卅三年秋淪陷後，始遷梅縣；梧州分社至抗戰行將勝利結束時，遷移於桂林，而改爲桂省的中央日報，并設南寧分版；梅縣分社則在抗戰勝利後晉爲梅縣中山日報，自行獨立經營。

戰後復員，中山日報總社亦在廣州復版，規模較前更大；并依過去成例，實行兼營印刷業務。蓋由於戰時政府疏散至遷治地區，各種刊物亟待補充或繼續發行，而內地印刷業實苦無法供應。中山日報各地分社均以印刷器材與技術等素較充實而完善，在服務原則下，多代爲印製。這在新聞業務的發展上，也得到直接間接很多互助的利益。

由於這種工作的聯繫，精神的團結，或更由於該報素得各界人士的重視，中山日報從業人員每遇流離遷徙，不祇編輯與外勤記者等全體同行，即印刷工友與報童等也自動從行，不避艱險。至編輯如陳燮勛（梅縣版分社主任）、陳儼華（韶關版總編輯）、黃堃繁（韶關版採訪主任）或於抗戰

期中，如劉帆聲（梧州版及南寧分社主任）、陳勁倪（梅縣中山日報總編輯）梁伯文（梅縣中山日報採訪主任）等，或任職直到大陸淪於共黨魔掌，均先後壯烈殉職。至於印刷工友中如黎健生、顏旺、李均培（韶關中山日報印刷、排字、鑄字等領工），陳偉東、羅仰高（梅縣中山日報印刷領工）等等，均由廣州原籍間關千里，不辭跋涉，分赴他鄉，而堅守新聞崗位。

大陸淪陷之前，廣州中山日報已奉令改為廣州中央日報；淪陷之際，乃遷往海南島繼續出版。該島淪陷後，該社記者羣又輾轉前往台灣等地。

梅縣中山日報的景況更艱苦，而奮鬥則更英勇。蓋因當地的專員、縣長，連同保安團隊，均於卅八年五月初突然叛變。該報事先雖有應變準備，但因為時金元券價值疊疊猛降，報社已陷入經濟上的絕大困境。而四境交通斷絕，該報的主要工作人員祇能化裝分批疏散，到了汕頭，分別集結。是年七、八月間，國軍由贛南轉進粵東，收復梅縣，該報并曾一度復版。工作人員旋又隨軍再撤至汕頭，梅縣中山日報始與汕報聯合恢復出版。直到同年十月中旬，汕頭亦陷匪手，該報人員始分赴香港，以至南洋各地，或輾轉前往台灣，繼續他們的文教工作。

上述各種新聞工作實況，說明了什麼？至少可以扼要的提供五點意見：

第一、這說明新聞事業無論從任何立場看來，在理論上縱已抱着「獨立」與「自由」的崇高理想，並以服務社會，造福人羣為職志，但在事實上，廣泛的所謂「社會」，不如具體稱為「國家」，或更具體的稱為維護公理公法的政府與摯愛自由與正義和平的同胞。離開忠誠守法的合法政府，真正的新聞事業即無法生存，更無從發展。

其次，新聞事業怎樣纔可稱爲「獨立」？「獨立」又應作如何解釋呢？人民自出資本來經營的報紙，名義上通稱爲「獨立」的；但實際上在業務的聯繫方面，如廣告的來源和銷流的主要對象；在精神的寄託方面，如某種主義的信仰，或本報宗旨的實踐；在經濟的發展方面，如報業在競爭中必須不斷的充實設備與擴大業務，而且謀獲適當的利潤；尤其是在戰亂期間，顛沛流離之際，如果平時不和其他正常的文教、經濟，甚至政軍機構早有互助互惠的友誼合作，在危急期間就更難得到聯絡的互助以求生存發展。因此狹義的「獨立」勢將陷入「孤立」，而在動盪的局勢中，「孤立」必難歷艱險而猶得生存。李教授雖在理論上讚揚報紙「獨立」之可貴，但事實上他的經驗既已證明擁護公理正義與國策的精神是獨立的；但在工作上，仍須秉承此精神以團結友好互助的文教社團或政、經等項機構，以推進其道義上的合作，發展其生命和業務。中山日報的史實就是一個顯著的例証。

第三、在新聞事業的發展上，配合社會的需要和經濟的狀況，必然要擴大到兼營其他業務上去，而不應呆守「爲辦報而專辦報」的孤壘。中山日報的史實既証明它曾兼印發叢書，助刊雜誌，兼營一般印刷業務；倘照當時的理想，且將兼辦英文雜誌，以廣國際文化工作。秉此一貫的計劃，梅縣中山日報且自卅五年夏到卅八年五月，即積極號召海外僑胞回鄉投資，推行各種經濟建設。該報且已聯絡當地工程與教育等界人士，實施各鄉水利工程，策劃水電建設，並探測礦藏，試驗造紙，協助製造陶瓷器，更聯絡各鄉中學，設計推廣並改良畜牧、稻種、堆肥……等經建工作。該報進一步且謀設獎學金，派送青年前往台灣等適當地區專習農田水利，水電工程，與畜牧獸醫等科。民卅七年夏，記者時在梅縣，更和當地的文教領導人士，協議籌辦嘉應大學，而儘先於卅八年

一月設立法學院，并特重經建人材之培養；兼謀以當地素負盛名的德濟醫院（德、瑞兩國的巴塞會傳教士所辦）為基礎，設立醫學院；及以增建的天字岌校舍為基礎，而增辦農學院。這種龐大計劃的擬訂和推動，就是以梅縣中山日報社為宣傳與實施的核心。倘非因法幣與金元券的先後貶值，則該報于擴展本業之外，還可投資于經建文教等業而加速其進展。倘非因大陸淪陷，則過去八年中，該報的「兼辦」文教經濟事業，亦必先後能有重大的表現。這說明什麼？說明新聞事業若祇做本身業務的擴展，最多祇是故步自封。但依國家社會的需要與事理來評議，高談各種建設，不如實際倡導各種應有的建設。

就上述一個原則來說，美國的聯合通訊社之設立，是由數十家報紙聯謀創辦的。美國現代的巨報，如赫斯特系的聯線（Newspaper Chain），更于設立國際通訊社之外，兼設廣播電台，又兼營造紙與運輸等等。芝加哥的論壇報（Chicago Daily Tribune）則兼營滑稽的連環圖和諷刺畫等企業組合（Syndicate）；而和該報的主辦人麥可密克上校（已故）有血統關係的柏德遜上尉（Captain Joe Patterson）主辦的紐約每日新聞，則早已兼辦「自由週刊」（Liberty）。這不過隨便舉幾個例子，以明報紙兼辦其他業務，有的是出於實際上的必要，有些是客觀上由於適應國家民族或社會的要求。

不講美國的「報業大王」，且舉一個「小小例子」：巴西的石道勃利安（Francisco de Assis Chateaubriand Bandeira de Mello 別號祇稱石道Chato），他主持的報業擁有三十一家日報，五個雜誌，二十三個廣播電台，三個電視台，一個博物館；此外，他更以私人資格設立了一百個託兒所。很多中國人或許還不知道巴西在什麼地方，更罕曾聽到過石道的大名；可是我們要知道，巴西的報

人遠比我中國的「報界大亨」強得多！我們還有多少地方應該努力，還要費多少精神、智力和金錢，纔有希望趕上他們！

第四、原想另用專篇來討論的，這是關於國際宣傳。因為裏頭再要分爲對僑胞宣傳和對各國宣傳。這個題目太大，意義也很重要而複雜，但却最爲國人所忽畧，所以記者久已要用「雙軌與多方的新聞事業」來做專題討論，并加強對於國人的鼓吹。現在祇能就個人的經驗，扼要一述其要旨。上面曾談到廣州中山日報得到廣州英文日報的協助，以擴展對於國際宣傳的事例，這裡補充幾個重要的理由：

(一) 中文報紙高談國際問題，甚或怒斥史大林爲惡魔，尼赫魯爲無賴，這類文字祇能算是「對內報導」，或「自我陶醉」。事實上不祇史、尼諸氏無從知道我們的高論，就是很多友邦的消息靈通人士，對於中國的新聞界和中國的情況，也祇能作一知半解，莫測高深。

(二) 國人自己不致力於使用普通的外國人士易懂的各種外國語文以發展「此類新聞事業」以實收新聞報導的功效，則大致就要遭遇至少三種失敗的悲運：(1) 自己不宜傳，而敵人「替我們宣傳」，他們必然揚惡隱善，大事歪曲報導與肆意誣譏，把我們描寫爲「尚未開化的，無能的，……一切離奇的集團」。這類宣傳常可使我們的朋友也嚇壞了，或且嚇跑了。(2) 各國的記者文人替我們宣傳，有好有壞，但大致的趨勢雖在開始時很好的，後來也可能變壞，變得且將更壞。這一種「倒戈」年前曾使我們創痛鉅深，連辯護的機會也就很少——除非我們自己也擁有強力的國際宣傳工具。(3) 國際宣傳貧弱一連串的結果，顯然的久使中國在世界的「心戰」場上缺乏真正堅定而忠實的盟邦——因爲友人也或不免誤信敵人與「同路人」的龐大、深入、而且惡毒的宣傳！在心戰的

外圍，中國經常是孤立，而缺乏主動進攻或反攻的力量；更由於外圍的勢孤，直接間接影響到國內的（暫假定爲心戰的內圍的）人心也惶惑不寧，再刺激着經濟和社會的動盪不安。

一九四三至四九年間，中國倘有真正堅定而忠實的盟邦，不祇東亞的局勢可以轉危爲安，並且世界的局勢也已可能改觀。但是在那時期，中國爲什麼連一個最切實的盟友也疏遠了呢？這是由於敵人心戰的惡毒，而中國心戰工作的貧弱。

現在重讀董顯光博士在一九四八年出版的「中國和世界輿情」(China and the world press 英文本，二一五至二三一頁，二五二至二七〇頁)，深感由抗戰後期到戰後復員期間，中國倘若自己擁有較強大的國際報導工具，比方完善的英文報紙、雜誌、通訊、廣播、和各種圖片，以至其他文藝作品。一方面在基本上可以增加外國記者羣對於採訪中國新聞的便利，預防他們因隔膜以生誤會，或其他因偏私而不免歪曲的對外通訊；又一方面，則在他們作了歪曲的報導或惡意的誣衊之後，我們自己還可能作有效的糾正或反駁，而不讓他們肆無忌憚的，濫作含沙射影的「報導」。

顯然的，我們自己未能在國際心戰中盡最大的努力，未能作應有的新聞報導，我們的心戰外圍不祇不能反攻，抑且已難防守。真正堅定而忠實的友人當然也不少，但他們在美國尙難應付共產國際龐大而深入的「宣傳與間諜」的聯合攻勢。我們的友人，橫被誣詆爲「中國遊說」(China Lobby)，因此他們的言動大受拘束。可是其黨走卒與其同路人，連同滲入美國當時國務院的希斯(Alger Hiss)及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之類，或滲入一般文教社團，以肆逞其叫囂誣衊的慣技；與財政部次長懷特(Harry D. White)之流，却從未得到「蘇俄走卒」或「蘇俄遊說」的烙印。他們安然的直接協助艾奇遜與傑賽普「訂立」了奸惡的「中國政策」，同時亦即協助一般媚共的記者如賀爾門

(Harrison Forman)、史因(Guenther Stein)、與艾甫史(Iracl Epstein)之流，完成了他們奸詭淘金的新聞傑作。(參看「時代週刊」，一九五五年七月廿五日，第四七至四八頁)。

因此，這裏應該特別指明：在國際心戰場上，既有不少外國的新聞記者出賣靈魂，而甘爲共匪的走卒，在我們的外圍線上猛作顛覆我們國家的龐大攻勢，由包圍、滲透以至突襲，或兼作奸惡的笑臉而陰佈陷阱，或散放有毒的烟幕，而密作更大的攻勢。反觀我們的新聞工作，尙自滿於「內圍」的「困鬥」，在「點和線上」作缺乏聯系或缺乏實效的「自衛心戰」。兩相對照，我們就可以看出「惡狼環攻於戶外，而儒生清談於室中」，這種局勢之險惡，可爲一九四三年到四九年「中國新聞界」的寫照。這種局勢是否繼續不停，或忽斷忽續的重演不息？這個問題當亦不難解答！

歸根結底，純正合手理想的新聞事業是「爲社會謀福利」。所謂「社會福利」中，照現在的世界情勢看來，那有比自己的國家獨立、自由、安全、進步與繁榮爲更大的更切要的福利呢？如果沒有了國家，在國內的各種社會，連同記者本身，有何光榮或福利之可言呢？因此，爲「社會謀福利」這一個崇高理想，當植基於爲國家謀自由、獨立、平等、安全、和進步與繁榮。新聞工作因此亦必須依此立場，以擴展到國際方面。

第五，從一九四三年到四九年，可以說中國新聞界的「七年之厄」——或任何其他好聽一些的名詞，如「七年之癢」之類，有識之士早已認識「改絃易轍」，發憤自強之必要。戰時重慶的廣播電台就曾以「國際廣播電台」爲名，昆明也有互相聯繫的「國際台」；戰後的上海也有國際廣播電台。慚愧的是多年來故步自封，兜圈子式的「進步」，實令人不敢恭維。再講到中國記者刊行的外國文報紙、雜誌、以至外文的電訊、圖片等等，直到現在還似在冰天雪地中萌芽，尙難得到應有的

重視和培育。以此而言「新聞事業」，顯然似祇擺出「泱泱大國」的架子，乾脆標明一個不屑舉辦「外國語文」的報紙或廣播之類的「下策」。同樣，在心戰場上，有些大人先生硬要在聯合國或其他國際會議場中用中國語文，以爭面子。可是問題還在「洋人」聽不懂中國語，看不懂中國文，所以必須翻譯為他們所瞭解的各該國語文。但事實上，以其由他人翻譯或不免曲解誤譯，在那種場合中，已不如直捷了當的由我們自由發表適當的外文詞語。這祇是外交工具或心戰武器利用以求有效的問題，談不到老生抱殘守闕的「面子」之類。同樣，在國際新聞線上，我們也必須善用外國人（由友人、中立人，以至敵人等）所能了解的語言文字與圖片之類，而這些都應該是外國語文或圖象所傳達的。傳達失效即不能稱為「新聞報導」，傳達失真即不能謂為達成新聞任務。

抗戰期間，董顯光博士任宣傳部副部長兼國際宣傳處長，即曾深感國際宣傳之重要，同時痛感我國對外宣傳人才的缺乏。因此他在民國二十二年冬，曾毅然創辦新聞學院於重慶，而延請美國教授或專家克羅斯（Harold Cross）、甘露德（Rodney Gildert）等七人，先後前往任教。在最初兩年中，該院有了六十個畢業生。董博士原有計劃繼續辦去，希望訓練五千名有志於新聞業的男女青年；但因爲戰後復員等種種關係，該院祇辦了兩期就停止了。

中國需要發展國際的新聞報導工作，當比抗日戰時更爲迫切。如何聯結忠實的盟友，而祛除其隔膜、誤會、或偏私成見，而促進合作以對抗共同敵人？如何在「中立」的陣營中贏得更多的盟友，以減少敵人的聲勢。如何在敵國境內也分別爭取能和民主陣營合作的社團或某種職業部門的人士，而收取協力摧毀鐵幕的功效？中國的新聞記者們必須從「新時代的新使命」中認識其使命之重大，而努力發展其應有的工作！

記者在抗戰前從事新聞工作，兼和羅香林教授在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同辦「廣州學報」，月出一冊，每冊都附有各篇學術論文的英文提要，而每期都分贈全世界各著名大學的圖書館和公立圖書館。第一步希望中國的學術思想可由此逐漸傳達於美、英、德、日等國；第二步希望由此充實市立圖書館的各國書刊，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而商請各受贈的機構也有回報；第三步希望由逐漸擴增英文篇幅，或更進而發刊英、法、日，等文的雜誌書刊，以加強達到上兩項目標。但不幸日本侵華戰起，而學報的刊行也因此而停止。

直到戰事結束後，記者回到梅縣，深願新聞紙的銷流能深入粵東、閩西、贛南這一區的學校、商店、和農村、礦場；更遠及非洲東部，以迄印度、馬來亞，而至印尼等地的華僑社團（因為海外華僑在戰後均渴望得知家鄉新聞），因此除了分批郵寄報紙於上述各地，更在印度之加爾各答，和馬來亞的怡保，設立分銷處；并在台灣的台南，也設立通訊和辦事處。自民國卅六年年後就進一步計劃以新聞業為基礎，以推進教育和經濟等項企業，已在逐步實施中；聯帶的就企圖在中山日報附刊中文叢書（已出關於提倡節約和幣制改革論集兩種）之後，兼試辦適合中等學生閱讀的英文雜誌，更進而創刊比較精當的英文雜誌。不幸卅八年五月以後，粵東淪陷，全部計劃，遂以挫折。

連年雖尚從事文教工作，深愧「老馬挨磨團團轉，七年仍在老地方」；對於新聞政策也曾疊有建議，外表上尚受各方「讚稱」，實際上却很少人能冒艱苦以發展新時代的新聞事業。又嘗草「廣播和電影的新聞工作」，僅及萬字即擱置篋底。今讀李教授的鉅著「新聞學」，不禁感慨橫溢，深佩其學說足以啟發青年，或並促使老氣橫秋的報人們愈知中國新聞事業之落後有所改進。